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陈思和 丁帆 / 主编



因缘际会 →

——七月社、希望社 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

周燕芬 / 著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陈思和 丁帆 / 主编



因缘际会

七月社、希望社
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

周燕芬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周燕芬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11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丛书/陈思和,丁帆主编)

ISBN 978—7—5430—4445—6

I. ①因… II. ①周… III. ①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7588 号

主 编:陈思和 丁 帆

著 者:周燕芬

责任编辑:李杏华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40mm 1/32

印 张:14.25 字 数:285 千字 插 页:3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序

陈思和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是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地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共两辑。第一辑七种,分别是《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台湾栎社以及施蛰存、刘呐鸥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由我和丁帆教授联袂主编。2006年完成。最初计划远不止七种,因为教育部要在规定期限内检查成果,于是将已经定稿的著作编成第一辑,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第二辑八种著述基本延续了第一辑包罗万象的风格,既有新月社、狂飙社、以《七月》《希望》为中心的胡风派文艺社团、延安地区的文艺社团、台湾创世纪社,也有台湾—厦门的菽庄诗社、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宋诗派诗人群体等等,还有当代文学史上的“探索者”冤案。其实,即使新加了这八种研究成果,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的课题还远远没有穷尽,因此我们仍须努力,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有关文学社团的研究成果积累并不多。据范泉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所收辞目,有关文学社团的1035条,文学流派的47条(其中不少流派也是有影响的“文人群体”,应属社团之类)。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文学

所领衔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里,真正成书的只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十来种,连语丝、新月、南国这样一些重大社团的资料也付之阙如;20世纪90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推出一套颇有规模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分研究、资料两个系列,但最后也只出版了《新青年》和《新潮》、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弥洒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几种资料汇编(包括作品集和评论集),研究方面似乎只有一本浅草社和沉钟社的论著,其他都似不了了之。有关文学社团的整体性研究,除了陈万雄先生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朱寿桐先生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王晓明先生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等少数论著,以及关于创造社、浅草社等少数研究成果外,大多数文学社团都缺少专门的研究。倒是在相关作家传记研究中有一些涉及社团的资料积累,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这些研究成果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相比,显然是不相称的。

而且,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既然是“中国”,就不能仅以大陆地区为限,近代史上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都产生过许多文学社团。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出现了大小古典诗社多达三百余个,可说是每一个村落就有一个诗社,这样一种壮观的诗社现象,如果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真是谈不上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社团史;而且,既然“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文学”还包括了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现象,如南社——清末民初的重要社团,由于它不属于新文学,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学视野以外,这都是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现在要真正做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还没有具备成熟的条件。为此,我们对这个项目重新做了课题论证,从实际出发,完成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作为第一步,就是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

学社团给以资料搜集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系列个案研究。或者说,整体上的现代文学社团史暂时无法完成,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些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这就是目前这套研究书系的大概面貌。在已经完成的十五个子项目中,文学社团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形式,如南社、宋诗派诗人群体、台湾栎社等,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余高雅消遣的文学活动。第二种形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抗议或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一体的两面,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社团形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一批作者队伍,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存在社团也就存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性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倾向性的审美意向,因此也可以算作某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现代文学社团的模式远不止以上四种,如有以政党意识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组织,还有纯粹的演剧组织等等,暂时都不在本系列研究之中。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是不一样的。前者研究的是文学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作家艺术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两者混在一起研究,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活动。这套书系偏重在人事,这是事先就规定好的,强调社团是如何

形成、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相处、社团与社团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展开,等等,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都作为描述的对象,这样,以便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朱寿桐教授在审读本丛书中的一本“创造社研究”时指出:这本著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寻绎创造社这一风格独异的文学社团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历史,体现出一种精彩而务实的社团研究学术自觉。文学社团是由人构成的,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特质和各种复杂性都与人员构成密切相关。以前的创造社研究,主要从大致的理念和情感取向着手,对于创造社的内部人员结构、权力结构常常取模糊姿态,致使许多问题只能流于语焉不详,如创造社的方向转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创造社小伙计与元老派的实际关系到底如何。这本著作从创造社人员构成及其权力构成的角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创造社研究而言的,但也说出了每一个社团研究所希求的努力方向。

二十年前,前辈学者曾华鹏教授和范伯群教授曾经协助贾植芳先生主编了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的论著,编撰了关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二十几个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论文。曾、范两位前辈是贾植芳先生在 1950 年代的学生,我是贾先生在 1980 年代的学生,我们同门两代,也可以说,我现在做的工作,正是在前辈学者所奠定的学术基础上的努力推进。记得有一次我向两位前辈汇报了这套书系的编写情况后,范教授听了哈哈大笑,说:“我们当年要求每个社团流派研究是一篇论文,你们现在要求每个文学社团研究是一部专著,这就是进步了。”是啊,应该说是学科发展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前后竟相隔二十年,实在也是太久了一些。我感慨。

目录

Contents

因缘际会
——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

总序

1

第一章

缘起——左联与七月社关系之研究

- 一、左联及其内部斗争的缘起 / 1
- 二、雪峰派·胡风派·鲁迅派 / 12
- 三、胡风——左联阵营中的另类 / 23
- 四、“两个口号”论争与盟派的浮出 / 34

第二章

46

七月社及相关社团

- 一、背景：巨星陨落，战火纷起 / 46
- 二、《七月》的由来与流变过程 / 53
- 三、《七月》的构成——同人、半同人与“初来者” / 73
- 四、七月社的构成形式与社团特征 / 106
- 五、《七月》停刊后的《诗垦地》与平原诗社 / 129

第三章

136

希望社及相关社团

- 一、背景：抗战从“兴奋”到“沉炼” / 136
- 二、南天出版社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 / 142
- 三、《希望》和希望出版社 / 155
- 四、《七月》到《希望》——社团队伍的分化与重组 / 164
- 五、希望社社团特征以及摩擦与对抗的产生 / 209
- 六、《希望》终刊后的其他社团活动 / 228

目录

Contents

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

第四章

“胡风集团”

- 一、胡风的寂寞与挣扎 / 253
 - 二、舒芜“倒戈”与学界公案 / 288
 - 三、文坛宿怨与政治清算 / 328
 - 四、文学社团到“胡风集团” / 338

附录一

参考文献

附录一

相关期刊和从书目录

- 一、《七月》目录(共 35 期) / 351
 - 二、《希望》目录(共 8 期) / 381
 - 三、《诗星地》目录(1 至 6 辑) / 393
 - 四、《诗星地》副刊目录(共 25 期) / 400
 - 五、《呼吸》目录(1 至 3 期) / 407
 - 六、《泥土》目录(1 至 7 辑) / 411
 - 七、《蚂蚁小集》目录(1 至 6 辑) / 418
 - 八、《起点》目录(1 至 2 期) / 424
 - 九、《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和《七月新丛》/ 426

附录三

胡风相关社团编年大事记

后记

2

第一章

缘起——左联与七月社关系之研究

一、左联及其内部斗争的缘起

1933年6月15日，日本客船“长崎丸”号抵达黄浦江上海码头。随船到达的有一批被日方遣送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之后成为左联新任负责人的胡风。此次回国，标志着胡风正式参加了国内左联文艺运动。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的文艺活动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1年新文艺作品出现的时候，胡风“狂热地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接受了它们”，和当时大批进步青年一样，胡风在革命的环境中写着忧郁的诗，激情中透着焦灼与迷惘。1929年9月赴日留学是胡风人生的第一次大转折，他被正在蓬勃开展的日本普罗文学运动所吸引，醉心于阅读苏联文学作品，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风自己说，他逐步“解除了社会观与文艺观的矛盾，从忧郁的情网里面跳了出来，”思想走向激进。他“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东京支部，开始用评论参加了国内的思想斗争”，^①并成为一名日共党员。1933

^① 胡风：《〈胡风评论集〉后记》，《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

年3月,因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和宣传抗日等罪名,胡风在东京被捕,拘留三个月后,与聂绀弩、周颖等十多个人一起,被驱逐回国。

其实,在这次回国的前一年冬天,因向文总^①汇报日本反战同盟计划召开反战会议以及新兴文化研究会的事情,胡风曾短期回上海一次,第一次见到了冯雪峰、周扬、丁玲、穆木天等左翼核心人物。也正是在这第一次的交往当中,胡风敏锐地感觉到“鲁迅和创造社在思想上的对立有很深的根源和社会基础,那明显地反映在冯雪峰和周扬、穆木天的对立上面”^②。于是,当与冯雪峰的交谈中涉及让胡风做文总的组织工作或者左联的宣传工作时,胡风感到很惶惑,提出“回东京看看再说”。胡风觉得,在左联内部矛盾复杂纠缠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资历和学历,“都没有条件在左联这种革命团体做领导工作”。他“决定还是回东京去住一两年,弄一弄基本理论问题,免得陷进宗派纠纷里面”^③。但是,胡风自认为明智的选择也只不过维持了半年多时间。此次被驱逐回国,意味着他必须再一次面对选择。实际上他也别无选择,他只能在大批新文学家汇聚的上海,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左联这个团体中,发挥自己的才干,开拓自己的事业。

成立于1930年3月2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1928年1月以来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和蒋光慈、阿英领导的太阳社正式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并随之掀起革命文学论争的背景下产生的。而1928年崛起的革命文学论争,一方面是由于大革命失败这一政治形势的突变所推动,另一方面也是革命派作家们激进的左倾思想所导致,同时也有革命派内部宗派情绪的原因。论争中重点围攻清算的鲁迅、茅

① 即1930年4月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

② 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7卷,第286页。

③ 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7卷,第287页。

盾、叶圣陶、郁达夫等，都是五四以来的知名作家，^①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力和成就，形成各自相当成熟、卓越的文学风格，成为文坛上极具号召力的作家。批判这些作家，无疑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全盘否定，同时也看出批判者们“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②，破坏他们在文坛的主力声誉从而取而代之的个人野心。革命文学论争引起国共两党的关注。国民政府很快解散了创造社，并清理和扼杀文坛上的无产阶级文学；共产党看到这场论战中所谓革命文学对“同路人”的围攻，反而削弱了无产阶级文学自身的力量，感觉到有必要“采取比较温和与有弹性的文学路线”^③，以便团结更多的作家一起对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于是，1929年秋，李富春代表中共指示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和鲁迅、茅盾等作家联合起来，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书记潘汉年，向创造社和太阳社方面传达中共停止文艺界“内战”的主张，组织大家进行自我批评，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鲁迅要尊重。”^⑤另外，准备派冯雪峰、冯乃超和夏衍去和鲁迅进行沟通。

1929年10月的一天，冯雪峰作为党和鲁迅之间的联系人，受潘汉年的委托，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事宜，取得了鲁迅的谅解和支持。当

① 冯乃超在1928年1月出版的《文化批判》中，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称这些作家为“既成作家”。

② 成仿吾：《打发他们去》，《文化批判》1928年第2号。

③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编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

④ 关于最先提出筹建左联有另一种说法，即开完“六大”回国的周恩来从鲁迅的学生任国桢处看到鲁迅的一封信，“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论争的不满，恩来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43页。

⑤ 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征询是否可用“左翼”旗号时，“鲁迅态度却很明朗，说‘左翼’两字旗帜鲜明^①”。冯乃超和夏衍与鲁迅的商谈也很顺利，“鲁迅对于年轻人的做法，是谅解的，表示愿意团结起来。”^②1930年2月，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沈端先（夏衍）、阳翰笙、柔石等人集会，协商筹备左联的成立工作，共同检讨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和论战中的偏颇错误，“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艺运动的任务”。

左联的正式发起人（也称为“筹备委员会”或“基本构成员”）有鲁迅、沈端先（夏衍）、冯雪峰、阳翰笙、冯乃超、钱杏邨、柔石、洪灵菲、蒋光慈、郑伯奇等十二人，^③约有五十多位作家署名加盟，后来茅盾、周起应（周扬）相继从日本回国，也参加了左联。左联成立之后影响渐大，人数不断增加，并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州，以致日本东京，胡风和聂绀弩最早就是参加了东京的左联活动。左联同时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是冯乃超，1931年由冯雪峰接任，周扬则在1933年到1935年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其他担任过左联书记的还有阳翰笙、钱杏邨、丁玲、任白戈和徐懋庸等。^④

左联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从左联成立到今天，对左联组

^① 《冯雪峰同志关于鲁迅、“左联”等问题的谈话》（1973年8月3日访问冯雪峰记录），《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内部发行，第167页。

^② 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左联回忆录》（上），第64页。

^③ 在冯雪峰、夏衍、阳翰笙、钱杏邨几位当事人的回忆中，对十二人的名单说法不一。参见周国伟：《左联史料考述》，《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3期。王宏志：《“左联”的组织与结构》，见《鲁迅与“左联”》，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发起人中有太阳社、创造社的成员，体现了左联谋求团结的意愿。郁达夫因鲁迅提名也列为发起人之一，但因故没有出席成立大会。

^④ 在冯雪峰、阳翰笙、夏衍、冯乃超、钱杏邨、丁玲几位当事人的回忆中，对左联历任党团书记的名单和任职时间也有不同说法，参见周国伟：《左联史料考述》，《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3期。王宏志：《“左联”的组织与结构》，见《鲁迅与“左联”》，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织性质的认识一直存有争议,这是我们研究左联及其内部矛盾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两条线索或者说两种思路牵制着左联的成立、发展乃至解散的全过程。一个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团体,另一个是以鲁迅为凝聚力量的进步群众文学团体,总的来讲二者是一致和统一的。但也时有芥蒂和冲突,这其中还交织着浓厚的文人小集团主义和宗派情绪,共同构成左联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状况。从左联成立的前期背景以及左联的人员构成和影响范围来看,应该是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群众性文学组织。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全社会的文学力量,左联“用反封建、反帝和反国民党的路线去吸引作家。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抉择,由于‘左联’的成立,共产党实现了它在文坛称尊的地位”^①。左联的成立,是共产党和左翼文学队伍合力促成,其目的是要达成革命的和进步文学力量的广泛团结,扩大其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左联又在不断强调自身的“为解放无产阶级而斗争”的立场,强调左联的共产主义性质,并且在团体组织上,忽视了它的群众性特点,把它看成是共产党一样的政治组织,听命于国际组织和国内共产党的领导,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忽视文学创作实绩,热衷于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活动,致使如蒋光赤(慈)、郁达夫等实力作家或者被开除,或者消极隐退,非但不能发挥预计的广泛性影响,反而导致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道:

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主要是把“左联”当作了直接政治斗争的一般群众的革命团体,而差不多忽视了它的应该特别发挥的特殊的战斗性能与作

^①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编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7 页。

用——文学斗争与思想斗争，并经过文学斗争与思想斗争去完成政治斗争的任务。……我们简直把“左联”当作“半政党”的团体，而在组织上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关门主义的错误。^①

茅盾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问题，他干脆说：“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②后来周扬也认同这个说法：“我们自己也感到确实是有关门主义，我们感到当时的‘左联’成了个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跟党是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这样搞起来，人家就怕了。”^③左联成员金丁回忆当时参加左联的动机时也说：“有出于自认为文学是终身可以从事的事业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左联’实际上和党的组织差不多。当时‘左联’有‘第二党’之称的。从这样的看法出发，参加‘左联’后，确实也有愈‘左’愈好的情绪。”^④

名义上的“作家团体”和实际上的“政党”或“第二党”构成一种矛盾或悖论，是左联内部矛盾的发生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逐渐盛行的必然原因。

何况，论争中积淀起来的集团间的恩怨隔阂，也不可能瞬间消除。之前的太阳社、创造社成员，今日的左联作家、评论家乃至领导人，他们曾以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自居，岂能轻易屈人之下？刚刚过去的革命文学的论争其实余音未了，虽然论战双方照顾大局走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② 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③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④ 金丁：《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进左联的同一营垒，但心底里彼此并未真正妥协。阳翰笙回忆当初潘汉年组织太阳社和创造社成员进行自我批评时，“也有个别的同志不表态，说鲁迅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实际上心中不以为然，但话讲得比较委婉，因为有李富春同志明确的指示”^①。冯雪峰曾经回忆自己当年整理发表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认为：“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一班子人对鲁迅的讲话并不重视，而且很不以为然，说：‘鲁迅还是老样子。’”^②迫于大的形势，左联初期基本上是团结的，但潜伏的成见和矛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抑止地暴露出来，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成员在左联的人事关系中，看重的依然是“老关系”和“小团体”。以鲁迅的战斗个性，他也不会轻易忘却与革命文学家们的这次激烈战事。他曾经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秉持同样的批判态度，在后来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曾旧事重提，可以说至死都没有卸除对此种极端“革命文学家”的防备之心。事实上，许多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者，“到了 30 年代左倾化之后，放弃了个性解放精神。像鲁迅这样申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③虽然鲁迅声称做“遵命文学”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失去自我，但他面对民族危难需要寻求战斗伙伴、需要借助集体力量的时候，他还是有所妥协的，这是鲁迅对左翼倾向认同的一个原因。但鲁迅的妥协是有限度的，一旦违背了个体原则，压抑了自由精神，他就要奋力反抗。这也是鲁迅后期愈来愈疏离左翼的一个原因。

在胡风回国之前，围绕鲁迅所发生的左联内部矛盾已经显露出来。鲁迅的放弃论争认同左联，首先源于鲁迅自己的政治意识。鲁迅

① 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左联回忆录》（上），第 64 页。

② 《冯雪峰同志关于鲁迅“左联”等问题的谈话》，《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 1977 年内部发行，第 173 页。

③ 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文汇读书周报》1999 年 5 月 1 日。

并不是坚定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坚守启蒙姿态,但他也不同于胡适的将启蒙限定于“文艺复兴”式的“纯粹”状态,完全排斥政治革命的方式,鲁迅坚定、彻底乃至极端的启蒙态度,使他时有认同政治革命的意向。此外,冯雪峰是影响鲁迅的一个重要人物。

当太阳社、创造社和鲁迅、茅盾正在进行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时,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冯雪峰(1903—1976),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对文坛的这场论争十分关注,对一些革命者盲目地参与对鲁迅的批判表示不满。1928年5月,他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知识阶级》(发表于《无轨列车》第2期)一文,表示了对鲁迅的支持态度。他认为:“实际上,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知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找不出空隙,可以断言鲁迅是诋谤过革命的。”“在艺术上鲁迅抓着了攻击国民性与人间的普遍的‘黑暗方面’,在文化批评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是鲁迅。”因此,他认为,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是由于“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这却是十分要不得的”。冯雪峰进而指出:“对于鲁迅的攻击,在革命的现阶段的态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的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革命现在对于知识阶级的要求,是至少使知识阶级承认革命。”^①创造社和太阳社如此打杀鲁迅以及团结在鲁迅周围的进步文学力量,对革命正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可见当时冯雪峰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此篇文章被认为是左翼文学运动图谋联合的最早呼声。

鲁迅自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这篇批评创造社、声援

^① 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雪峰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